

精神的证词

◎何言宏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神的证词

◎ 何言宏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证词 / 何言宏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77-9

I. 精… II. 何…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56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86012826 (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精神的证词

何言宏 著

出版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骏骅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354 千字

印 张: 23.25

书 号: ISBN 978-7-80762-377-9

定 价: 34.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

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

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 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3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话语表达与话语现代性问题	5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代性问题	108

第二辑 文学思潮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与现代性问题	159
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	181
文学体制、知识分子身份与晚生代写作	195
有闲阶级的“第二性写作”	207
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	231
批评的堕落与危机	247

第三辑 “介入” 的写作

胡风的牢狱写作与晚年心态	261
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	279

历史深处的精神逼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	293
现世空间的批判与重组	
——刘醒龙的两部长篇及相关话题	308
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	
——须一瓜论	319
王安忆的精神局限	337
后 记	363

精
神
的
证
词

第一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
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中国社会以市场化为重点的急剧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作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文学领域的历史处境与内部格局均都具有了新的特点。由于有着自身合法性逻辑的自主性的文学领域的出现与生成，意味着文学摆脱了对于其他领域的依附性关系从而成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这里所研究的，便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以及文学领域内部的急剧变革所产生的自主性问题。对于文学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从社会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由于法国学者布迪厄对于不同的社会领域，特别是文学、教育、学术、艺术、新闻和电视等领域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有力的研究，所以，我对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将主要借用布迪厄的理论资源。^① 在此意义上，我对文学“领域”的习惯性指称便将被文学“场域”所取代，而我所关注的问题，也将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强大的国家场域是以怎样的方式渗透于文学场域；二是经济场域又是怎样以其市场逻辑制约着文学生产；第三，则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中，对于中国文学自主性的建立提出虽不乐观但仍积极的主张。

^① 但是，由于布迪厄的研究所针对的主要是相当不同于中国的西方社会的场域问题，因此，我的研究将只是对布迪厄的问题框架或分析性概念的有限借用，而不是以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就范于布氏。

民族国家的文学实践

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的文学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为中国的不同于西方及传统社会主义的独特的现代性追求,相应于这一追求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也对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意识形态战略对于文学的要求,除了非常突出地表现于“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省市各级“作协”这一文学场域之中相当重要的《章程》往往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进行修改之外,^①主要是要文学对于“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②负有使命。1996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被看作是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一个重要方面的贯彻落实”^③,文艺被当作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承担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庄严职责”。^④1997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在重申“社会主义文艺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文艺肩负着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使命”。而以“进一步团结和动员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

① 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在《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将协会的指导思想相应地修改增加了“坚持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自己的任务修改增加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②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上的讲话》,2001年12月18日。

③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6日。

④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6日。

续奋斗”作为“目的”而召开的第七次“文代会”和第六次“作代会”，则仍然强调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①

而国家的文化战略对于文学的要求，则很突出地体现于它将文学纳入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伟工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的“后冷战”或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对减弱，民族国家之间体现于文化方面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国家的文化战略便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设计的文化方面，成了国家所期许的参与世界性文化竞争的重要力量。文学场域和文学实践作为文化场域与文化实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样，在整个中国的场域结构中尤为强大的国家场域，便对文学场域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主导性”要求，从而将其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不过，在90年代的中前期，国家对文学场域的“文化诉求”相对于“意识形态诉求”并不突出。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以及1997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意识形态色彩要远甚于文化色彩，而2001年《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上的讲话》，文化色彩却更加强烈。应该说，这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思想体系的变化不无关联。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两代会”上的《讲话》虽也对文学有着一定的文化诉求，但是，当时的诉求更多的是要文学在借鉴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应该“抵制殖民文化侵蚀”并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目的。而2001年《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的讲话》，却以相当的篇幅突出强调了全球性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讲话》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

^①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上的讲话》，2001年12月18日。

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此意义上，“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贡献力量”，便是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

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对于文学的宏观要求必然体现为具体的文学政策在实践中的真正落实。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国家的文学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重在建设，团结鼓劲”使得1949年以来文学场域之中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渐趋消失，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则是奠定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场域基本格局的最为重要的政策基础。“弘扬主旋律”，不仅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之文学要求的最高体现，更是被称为是“元场域”的民族国家利用其极为强大的政治资本（“元资本”）从而作为抽象的文学实践主体涉入文学场域，并且确定文学场域合法性原则的重大战略。

对于“主旋律”的具体内涵，政治领袖与意识形态领导人以及各级文化官员的“讲话”和一系列的政治文件都曾有着这样的阐释，即是“要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激发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①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国家场域在文学场域展开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学实践，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1997年1月11日。

从而建立了相当完备的“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在论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场域时，曾有论者指出，市场经济兴起以后，“一方面政治权力仍不放弃对文艺场域的控制影响，但另一方面市场对文艺场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日益显著”^①，具体于前者，则是如另一位论者所曾发现的“一套越来越清晰的与譬如‘文革’时期明显不同的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但是，他在同时所指出的“现在的管理重心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过程，而非其创作过程”的特点，^② 却并不全面。这是因为，就在针对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过程”的“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③ 的政策之外，国家对文学场域的“主导性”愿望，从作协体制、评奖制度、媒体控制和创作主体的规训与吸纳甚至创作过程的具体参与，以及作为一种合法性机制的文学评论等方面，均都有着相当充分的体现，只是与 80 年代相比，这些众多的具体方面在功能与策略上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就在于，国家在文学场域中所实行的评奖制度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实际上，正是以评奖制度作为核心，国家在文学场域组织了“主旋律”文学的大规模生产，从而建立了一套体系庞大、高效运作的文学生产机制。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极为简单地概括为“抓评奖，促生产”。

“主旋律”文学“抓评奖，促生产”的生产机制的首要任务，便是国家的文学奖励制度的建立，这一奖励制度，主要是以从国家到地方所层层建立的“‘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主干的“政府奖”体系。在国家层次上，这一体系主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及“冯牧文学奖”组成。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奖”体系则由地方党委主办的

① 徐贲：《布迪厄文艺社会学在中国的跨语境转换问题》，“世纪中国”，[http://www. cc. org. cn/](http://www.cc.org.cn/)，2002 年 4 月 12 日。

② 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1997 年 1 月 11 日。

“‘五个一工程’奖”和地方政府或作协主办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评奖组成，比如北京市的“老舍文学创作奖”、上海市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天津市的“青年作家创作奖”、江苏省的“紫金山文学奖”和内蒙古的“敖德斯尔文学奖”等。鉴于当时曾在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奖项众多的局面对于“政府奖”的“突出”性、“权威性”和“发挥正确导向和示范作用”^①的“冲淡”和影响，为了突出和维护“政府奖”的权威地位，国家加强了对于评奖活动的清理与审批。^②1997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少而精的原则，做好文艺评奖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全国性文艺新闻评奖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努力提高评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发挥正确导向和示范作用，未经批准立项的全国性奖项不得举办”，^③这些措施，对于维护“政府奖”体系的权威性，自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学场域的“政府奖”体系除了以上内容，还包括以“国务院政府津贴”、“杰出贡献奖”或授予“人民作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等方式对于作家的嘉奖。

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设立的“政府奖”体系，导致了从国家到地方的意识形态部门及各级政府、各级文联、作协、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机构和作家个人

① 杨朝岭：《市场：文艺评奖绕不开的话题》，《瞭望》，1997年第28期。

② 对此，当时的《瞭望》周刊记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据有关部门统计，至去年底止，文艺、新闻、出版等门类常设性、全国性评奖就有300多项，仅文艺类就有285项之多。奖项名目繁多，重复设置，不仅使得重要奖项不突出，而且还造成了评奖活动的混乱。由于评奖工作不规范，法制不健全，使得有些单位和个人从中渔利，随便几个人就可搭起一个‘草台班子’，随意打出‘××大赛’、‘××大展’、‘××大奖’，并扯起‘全国性’的大旗，招摇过市，向参展者收取费用。这些行为，毁坏了评奖的声誉，也干扰了其他正常评奖工作的秩序，使得假冒伪劣的获奖头衔满天飞，给有关部门的管理工作造成了混乱。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前不久，中央有关单位又对常设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项目进行了审批，批准了文艺类评奖37项，新闻类评奖11项，综合类评奖3项，文艺节类评奖4项，出版12项”，起初的300多项奖项被压缩至60余项（杨朝岭：《市场：文艺评奖绕不开的话题》，《瞭望》，1997年第28期）。

③ 杨朝岭：《市场：文艺评奖绕不开的话题》，《瞭望》，1997年第28期。

产生了普遍性的“获奖情结”。^① 获奖情况成了各级领导文化政绩的重要方面，获奖情况的总结不仅在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均有强调，也是其工作规划的重要方面。尤为突出的是，作为文学艺术工作的专业性团体，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文联和作协在对既往的文学工作进行总结的时候，已经不再像80年代那样注重于思想艺术比如主题、风格、创作方法、形式探索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的突破，而是侧重于突出强调某段时期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政府奖”中的获奖情况，侧重于总结其所承担和开展的“政府奖”工作。^② 比如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在从八个方面对于第六次文代会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的时候，在最具政治原则性的两个方面，即“加强理论学习，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和“开展‘万里采风’，倡导深入生活”之后的第三个方面，就以“加强评奖工作，推动理论建设”的标题总结了中国文联第六次文代会以来开展的评奖工作，对其附属的文学出版机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所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也特别说明，甚至“一些省市文联也组织生产了一批获‘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也在其总结之列。^③ 而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整个文本更是频繁出现“获奖”这样的字眼，似乎获奖与否以及所获奖项的级别和种类，已经成为衡量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成就的最为关键的标准。地方作协比如江苏省作协在其工作报告和工作规划中，文学获奖情况的总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就曾说过：“‘五个一工程’的评奖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省市自以及各部委之间精神产品生产的擂台赛”（《好书是怎样组织出版的》，《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10期）。

② 这些“总结”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就在于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品的影视改编情况得到了相当突出的强调，实际上，从文学价值和文学影响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翻译成世界其他语种的情况更有值得总结的必要。

③ 李树文：《团结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无出版日期，内部发行）。